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547309666

出版时间：2016-10-1

作者：刘志伟 孙歌

页数：2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作者简介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年）、《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年）、《探寻历史的“基体”：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书籍目录

对谈小引（孙歌）

一、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二、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

三、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

四、“中心”与“边缘”

五、局部与整体

六、区域研究中的“国家”

七、寻找中国原理

尾续语（刘志伟）

附录：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刘志伟教授访谈录

精彩短评

1、2017.1.21

许多启发

2、这本书/对话是很不容易的，在今天的学界已经很少见了。苛刻地说，既然是谈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的深度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

3、华南学派必读书目……倒是通过孙教授我重新梳理一下丸山真男和沟口雄三

4、值得再读

5、从抽象的“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不寻求脱离时空背景的、排他的普遍性论述；认识到历史研究者本身也是在具体时空下、有局限的人；区域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它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意义，而是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开心！||但和其他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分歧如何来讨论与和解呢？需要和解吗？

6、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是指思考的逻辑起点，即以国家为本位还是以人为本位。局部或者说区域研究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它是“国家”的具体化，这种研究是寻找“中国”的一个视角。研究者需要时刻反思自己的研究观，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必然有助于开拓自己的格局，不至于浑浑噩噩。

7、终于出出来大陆版了。。。想当年（好多年以前）港版刚出来的时候@金声拉着我打印，结果那本打印本早已不知道在哪了，最后竟然看的是另一个同学自扫的高清电子版~【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论电子书的重要性，你们这些无聊的人类，有时间在豆瓣上写那么些无聊的短评，就不能多从读秀里面盗几本书吗！】

8、再结构化，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形，在具体的时空中分析，很有启发性。

9、治社会史的刘志伟老师与治文学和思想史的孙歌老师之间的学术对话实录，基本上涵盖了以刘志伟老师为代表的华南学派的主要学术脉络与观点。其关于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分和界定，让人大开眼界，受益颇深。很有含金量的小册子。

10、对话是个好形式 如果要是写文章的话 很多想法可能永远无法变成文字 但是谈话可以w 如果把北大国关学生每天谈国事（x的对话记录下来 感觉也是不错的研究资料

11、对整体与部分、具体与抽象、历史与现实、社会与国家的解读都很到位，只有把时空关联纳入到认识论的基底，才有可能打破流传已久的种种dichotomy，在这方面，“历史人类学”的经验弥足珍贵。

12、很多地方是充满洞见的。

13、重要的书读三遍。

14、华南研究历史观的一次完美总结。刘老师从以人的行为为主体的历史入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具体之间讲明了区域研究的主旨。我们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将每一个“局部”视作研究的整体，在整体性的意识中去把握人的行为在此“局部”中的影响与感知。因为人有能动性，所以研究的问题、视角与方法不断发生变化，正是在这种“流动”中，我们从“区域”感知到了“整体”对于“区域”的多元意义。

15、华南学派的理论反省

16、好书，对于历史学还是有用的，然而……

17、每一个地方史研究者都应该精读，真是字字珠玑。

18、果然时不时需要读点方法论反思自己的思路。击碎了我的国家-社会的想象，想重新读一遍上学期刘安课上的专题文献。二刷写长评。

19、终于出了简体字的正式版，挺怀念两年前读的繁体字口袋本，为了讲课用，还动手扫描了一本。对比了一下，两版的内容似没有变动，书的个头也差不多。

20、很好读。西方话语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写什么与怎么写），动态的探索，学术和文学创作有相通之处。

21、去年听过刘志伟、赵世瑜两位老师联合的一个讲座，对谈环节，尤其引人入胜。这本小书主体就是对谈，治思想史的孙歌老师与华南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刘志伟老师的史学视域和方法论的对谈。华南研究的旨趣在这里面有非常清晰且深度的表述。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对历史及历史书写的高段见识，非常受用。

22、感觉这种形式还挺好的，既有整体的感觉，也有精髓碎片，不像是在苦读，而像是看小人书。

23、2017/05: 非常认同刘志伟的历史观，孙歌和刘志伟的谈话中提到试图探索一种中国原理也是非常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有价值的！刘志伟能够跳出中国学术的局限做自己的学术，真是佩服！要去读他的书！

24、谁看谁知道

25、典型的刘老师语言风格。读此书，更能理解华南研究群体的作品及背后理念、关怀。

26、从王朝国家和人民大众的视角之争到人的历史；注重在结构上对历史作出解释；华南研究的独特性以及华南学派想要通过独特性追求的一般性；粗浅地了解了华南学派到底在做什么。

27、“华南学派”，和而不同。

28、从人的角度去解释历史，注重整体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国家与社会关系部分颇有启发，还要多回味。

29、好书值得一读再读

30、三年前拿到蜜蜂书店的繁体口袋书，定价80元，大家(包括孙老师)都觉得这定价不是太高了点嘛！如今出来大陆版——包括定价什么的因素，可以让更多人方便看到了。2017.1.22今天贺老师赠我此书，谢谢

31、读完特别感动。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两位学者把问题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努力。整体性的追求，非同质的普遍性，在特殊性之中而不是个别性之上建立“形而下之理”，以及在结构中理解对象，都给我以极大启发。而这些看似在抽象的问题，其实无不与现实息息相关。其中一点讲传统中国的“均平”追求，实际上是承认差异基础之上的“均平”，而不是认为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平均”。这一点大概所有读过儒家书的人都有体会。而后者又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起墨家的思想，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的二次复兴与二次中绝。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呢？当问题被抛出来的时候，总有一天，有人会给出答案。从这个角度看，刘志伟在推进以后的忧虑，和孙歌在困境中的希望，与其说是相反的，不如说是一体的。

32、非常精彩！今年看完的第一本书是霍尔盖特的《黑格尔导论》，觉得很不错，最后一本就是它，也非常让人满意。

33、史识上的突破是非常振奋心智的。

34、很震撼的著作！

章节试读

1、《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25页

由于华德英的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对我们的华南研究启发很多，这里我想稍微扼要介绍一下。华德英是在结构主义框架下提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模型的理解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论社会结构的时候，提出有两种模型，一个是人们关于自身社会的意识建构，一个是来自外部观察者的建构，前者列维·斯特劳斯称为自觉意识模型或自制的模型，后者则称之为非自觉意识模型或观察者模型。华德英在对香港渔民的研究中，提出自觉意识模型还应该细分为“他们的近身模型”、“他们的理想观念模型”和“他们作为观察者的模型”，也许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来说，第一种模型是基于自身直接生活经验的意识建构，第二种模型是他们对自身的身份属性应该如何的意识建构，第三种模型是他们看待其他社群的意识建构。

这套理论没有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多少影响，有些学者提及时也似乎误读了，不是从结构主义的脉络去整体性地把握这个认知模型的结构。这里要详细解释有些困难，我只想强调，这几个模型是不能离开其结构主义的脉络去理解的。虽然我们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我们觉得华德英提出的这几种模型的关系，为解决上面那个问题，即中国千差万别的地方社会和文化，为什么和如何构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认识论路径。

2、《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26页

从思想史的加速说，比如在明末清初，当时一些思想家使用的一个概念叫做“人人”，本来说“民”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说“人人”？因为“民”其实是一个统合性概念。一位它是统合性的，她有可能被抽空成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3、《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25页

从以人为历史主体的观念看，每个人的世界中的国家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意义上的整体性，同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观念下的整体性不是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们的历史解释是从人出发，要回答中国是什么的时候，就必须假定有一种超越个人认识范围的能力。但是，我不想把这种研究的取向看成是唯一的，要压制其他取向的。我不能够回答人们关心的中国是什么的普遍性论述，但我不能排除人家要问这个问题。当人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他的论述。问题是，我自己总是宁愿把建立这种论述的过程和这种论述本身视为研究的对象，当听到有人说中国是什么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把这种论述对象化。我脑子即时萌出的想法，不是这个说法有多少真理性，或者其正确性在哪里，而是要问一系列的问题：他是在何种前提下，从何种出发点，表达何种观念，回应什么问题；进而有兴趣探究他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政治或文化议程，如此等等。

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七章 寻找中国原理

我们可能不愿意借用西方式的原理表述，或者在西方式的表述下稍加修订，去建立关于“中国的”解释，最好是能够使用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话语系统来建构这个原理。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真正摆脱所谓的西方话语，已经很难了，甚至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近代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整体上是一个西方的知识体系。离开了这个知识体系，我们会失去可以操作的学术思考和表达工具。这套话语系统，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已经构成我们思想过程的理性基础。在这个现实下，我们可以努力寻求一套“中国的”表述。这套表述当然需要立足在中国历史脉络下的知识体系和文人话语中，也需要理解乡村中识字和不识字的老百姓的观念和心理习惯。但困难在于，我们不可能不用我们这个由西方思想塑造出来的头脑去建构一套关于中国的社会理论或思想观念，这不仅由于我们要建构的是一套属于现代人类知识体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相信所谓“中国原理”的真正意义，是能够丰富以至改造主要由西方经验发展出来的社会理论和知识体系，也只有达到这样一种

结果，所谓“中国原理”才具有人类共同知识的价值。现在所有的困境，都似是而非地套到一个所谓的资本全球化的论述里面去了，其实推进了具体研究之后，会发现就这么个说法解释不了什么问题。

5、《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74页

6、《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31页

”我们的研究是以人的行为作为逻辑起点的，每个人都会从自己各式各样的目的出发，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习惯），同时，每个人的行为也必然受制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更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环境下行动，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个人的有目的性的行动的总和，会制造出一种集体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在实践过程中，会因为任何一种或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研究从来都不奢望可以把握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变化和因果关系，但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和解释这个过程的发生和变化机制，同时也累积着人类认识这个过程智慧和能力。就我自己而言，我在研究中的追求不过如此。我不认为研究的目的是找到一个答案，能够确证16世纪的社会发展到何种状态，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或描画一个宏大的

[32]
蓝图。这样的认识不是不需要，因为我们往往要借助对时代和社会的评估和认识去确定自己研究分析的限度和理解的空间。但是，我们要清楚这种定义与其说是研究的终点，不如说是研究过程需要借助的工具，因为这些定义及其表述可以在研究中一直流动，而且是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因着研究的问题和探求问题的视角的改变而改变。在我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当我确定在用一种方法去描述了认识的对象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在脑袋里让它马上流动起来，因为我很清楚，当自己把某一特定时刻的认识表达出来之后，自己的思维和认识就已经更新了，新的判断已经在前面等待着你。当你建立起一样新的确定性，就意味着在你的主观世界里制造了新的时空结构出来，这个时空结构马上就会影响研究者的下一个研究实践。在客体方面也是如此，当历史中的行动者在既定的结构下可以采取实施某种行为的时候，他就已经创造或改变了自己下一个行为时制约着他行动的那个结构出来。当这个结构一出来，他整个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以为追求普遍性不是我们做研究的目的，很多时候只是在研究或

[33]
者叙述过程中的一个策略性选择。当我说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隐含着我要说它可能在怎么变。这种认知能力的获得并以这样一种认知能力去建立对历史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是以人作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一个很基本的追求。

在这样一种追求下，人虽然是我们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但不可忘记的是，这个人，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塑造出来的人，他是社会的人，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也只能在历史制造的时空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文化形态和国家制度下行动，他是一个能动者，他在既有的结构下行动并创造新的结构，我在研究中所追求的，就是去建立对这个结构过程的认识。

我好像越说越抽象了，回到具体一点的话题上吧。我在研究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社会时候，不可避免要面对我们走进乡村中随处可见的许许多多的宗族祠堂，于是，在讨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将视线投到宗族现象，由此我的研究被标签为是做宗族，很多朋友常常要和我讨论宗族问题。比较常遇到的情况是，话题大多从说明他研究的地方的宗族和珠江三角洲不一样开

[34]
始。我听到这些指教的时候，当然不能判断是否不一样，但我觉得是否一样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因为只是说不一样，那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不用讨论我也知道一定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在珠江三角洲，甚至在同个乡村内部，宗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宗族形态的不一样，这个事实本身不是一个我们要得到的答案。我们期望更多了解的，是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在明清时代，在怎样的制度下，通过怎样的机制，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宗族或者其他形式的组织在乡村成为一种重要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又如何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历史，每一个局部地区存在形态的差异。引诱我们去追寻的，是这个地区经历的历史过程的不同。要建立这样的认识，追求普遍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不是说普遍性在我们的认识中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但是这个普遍性往往是在认知结构的层面，通过历史的结构过程去把握的，在研究中常常只是在思辨过程中的分析工具而已。

我一再谈到结构，可能会引起质疑，难道结构不是一种普遍性吗，结构难道不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甚至僵化性的东西吗？我想分歧也许恰恰出在这一点

刘志伟：

孙歌：

[35]
上，在我的观念里，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当然具有稳定性，但对于历史学者来说，结构又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结构的僵化，不是具体体现在这个社会的组成、文化各个因素之间动态的关系上，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过程中的结果，甚至只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我有时会觉得奇怪——本来历史学研究应该处理的是过程，但很多时候都过分执着于结构的稳定性，结果引出了很多无谓的争论。”

7、《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五章 局部与整体

在这个立场上，我也许可以回到你刚才的话前半部分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乡村、一个社区中，国家在什么位置？在那些规模比国家小的研究单位里，国家不只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权力，也内在于这个整体中，或者说，国家是这个整体的结构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研究所关心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在乡村社会中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和表达。这个国家可以体现为具体的政治与权力关系，也可以体现为法律和习惯，也可以体现为在这个整体中人们的行为（尤其是仪式）及其所表达的观念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国家存在，是这样一个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8、《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69页

刘志伟认为，清朝的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及一般人的生活层面，超越了任何年代。

9、《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37页

我们期望更多了解的，是在明清时代……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过程中的结果，甚至只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要知道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以及你是谁在干啥

10、《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一章 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在处理历史的时候，你（刘志伟）不受观念和已有的所谓理论框架的束缚，对你来说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总是在试图面对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的动态历史过程。

我（孙歌）觉得要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流动过程不仅仅是一套话语，而是需要我们尽量激活身体感觉来进入的那个用话语无法穷尽的主客体相互对话的过程。

你（刘志伟）在追问的不是国家、社会、民间、官方体制这样的一套话语系统所带来的固定感觉，其实你是破除掉这些东西，去追问人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如何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因此如何形成了社会，在这个形成社会的过程当中，过去的普通人，他们如何把国家机能作为生活的需要而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就是事实上比起研究对象来，研究视角才是决定性的。研究什么不能决定研究的性质，怎么研究才是决定性的。即使是同一个对象，从不同的视角看出去，也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图景。

这里实质的区分不在于是上层的历史还是下层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还是民众的历史、朝廷的历史还是百姓的历史，而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

近年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讨论，争辩应该更多关注民众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或纠结于应该强调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还是应该更多重视基层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在我（刘志伟）看来，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真正走出以国家或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这种争论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从人出发，那么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政府机构也好，民间组织也好，都不过是由人的行为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构出来的组织化、制度化单元，这些制度化的组织，当然影响并规限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家体系与民间社会，精英与民众，高雅的思想和卑劣的欲望，都一样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在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观下，无论研究的是精英的历史还是民众的历史，我以为在方法论上并无根本的分歧。

如果以一种更偏激一点的方式来说的话，其实根本的分歧在于怎么理解历史。如果我们假设历史是一切行动的总和，那么这个行动的主体是什么？如果历史的主体是国家，就可以演绎出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的论述；但如果历史的主体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由人的行为去建构起一个包括国家甚至一个更大范围的历史，也包括很多抽象的概念的历史。

过去，历史学讲到人民的历史的时候，就是农民起义。其实农民起义成为一个既定的概念，它就不是真正人民大众的历史了。“人民”只是一个被用国家意识形态赋予某种特定内涵的范畴而已，完完全全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范畴，而人的历史就这样被消解了。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根本的分歧，同样的概念，在国家历史的范式和人的历史的范式下，不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由于认知方法的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逻辑。

11、《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39页

。在这里，历史学者的理性，就不是把事实真相变成宗教，而是把握变化的逻辑思辨能力。无论是叙事还是辨识，我们都要让思想流动起来。我们的研究需要创造的是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能力。我所谓的再结构化不是要把一座房子一再地拆了再重建，而是把这个房子本身的建造和改造的过程作为研究的主题，通过房子主人的行为和周边环境变化等引出的种种改变，认识房子自身的结构和意义的不断的变化过程，并了解这个过程中持续起作用的复杂机制，关于这座房子的了解才能在我们的观念上成为能够被掌握和思考的知识。

12、《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二章 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

我们做历史研究，绝对不会企图去否定事实的存在、真相、意义和本质价值，我们只是努力从时间与空间的过程中去认识和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历史虚无主义也许在哲学上有一定意义，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没有什么裨益的。因此，听到你提到沟口先生追求“形而下之理”时，虽然我还不能够真正理解你们在思想史研究中追求的“形而下之理”，但我想我们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形而下之理”。是否可以这样说，这种追求或者可以使我们避免掉进（或被掉进）虚无主义的陷阱，是我们的一根“救命稻草”（笑）。

我们常常被追问，你们不追求普遍性，也不认可碎片化的研究，那你们的研究在追求什么？这的确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不妨试试以我们的研究实践来进行说明。我们的研究是以人的行为作为逻辑起点的，每个人都会从自己各式各样的目的出发，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习惯），同时，每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个人的行为也必然受制于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更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环境下行动，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个人的有目的性的行动的总和，会制造出一种集体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在实践过程中，会因为任何一种或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研究从来都不奢望可以把握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变化和因果关系，但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和解释这个过程的发生和变化机制，同时也累积着人类认识这个过程智慧和能力。

在这样一种追求下，人虽然是我们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但不可忘记的是，这个人，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塑造出来的人，他是社会的人，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也只能在历史制造的时空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文化形态和国家制度下行动，他是一个能动者，他在既有的结构下行动并创造新的结构，我在研究中所追求的，就是去建立对这个结构过程的认识。

如果我们的历史是以人为主体，那么在方法上，解释逻辑也一定是从人的行为出发，结构只有在人的行动中才有意义。人在历史中总是一个能动者，人的行为必须在既定的结构中进行，同时又改变着结构。

13、《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30页

西方的普遍性想象是要从无数个个别性当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性来……因此，它不同于我们习惯性的那种普遍性。形而上是一个工具，同样的形而下也是工具，但是如果把你的目标定义为寻找这个工具出来或者找出个普遍性来，感觉好无聊啊！好比说你是瞎子，你饿了想吃饭你得先找到碗，可惜你找碗找的久了，就忘了你想要吃饭的初心了，虽然你不是个人不至于饿死，但是本末倒置无非是徒劳一场空

1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六章 区域研究中的中国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面对的国家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不只是区域里面的，也包括区域之外的那个权力中心。但是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意义的“国家”权力，一定是内化于这个区域社会结构内那个权力格局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国家，或者所谓中国论述，只能是在特定的时空之中的，不能放大为可以跨越时空的中国。我们看到中国不同的区域，社会和文化千差万别，而且所谓的“正统”也很不一样，“标准”也形态各异，但这些差别都在一个中华帝国的框架，一个“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的范畴之内。正是这些在不同时空的千差万别的“正统”和“标准”，构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不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就很难建立起所谓的中国论述。对，所以换一句话说，大概也可以这样讲，中国既是“一”，又是“无数”。问题在于，这个一和无数并不对立，而且一并不是从无数中抽象出来的，相反，它只能借助于无数才能呈现自身。

15、《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24页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我们研究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甚至可能有点永恒味道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研究中不断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不同的区域，中国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为什么它还是一个中国？我们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同一些美国学者讨论，他们指出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其实并没有用同一种正统化的标准，很多看起来一样的信仰和礼仪，其实各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这种各地形态各异的事实，不应该是我们研究的结论，而应该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不应该只停留在“中国”的不一样之上，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问这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为什么还是一个中国？这种看上去是一种悖论的说法，好像有点故弄玄虚，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中国不同的区域，社会和文化千差万别，而且所谓的“正统”也很不一样，“标准”也形态各异，但这些差别都在一个中华帝国的框架，一个“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的范畴之内。正是这些在不同时空的千差万别的“正统”和“标准”，构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不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就很难建立起所谓的中国论述。

16、《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21页

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期，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下层民众，而在于历史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

17、《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69页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平均跟近代的平均有很不同的意义……还有，在承认人有差异，以人的差异为前提的平均，与假定人人平等的平均，也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记得古人是惜墨如金的，一个字儿一个或者是多个意思，一时间想不起来例子了，就像是这段话后面说的，当时以差异为基础和今天的以没有差异为基础，虽然结果都是平均，但是基础不同所建立的上层建筑也不一样，如果望文生义，我很喜欢这样干，到也无妨，倒是搞学术研究也这样干，就业余的过份了

18、《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49页

19、《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5页

我们也许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以人为历史的主体……即使是同一个对象，从不同的视角看出去，也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图景国家的历史也好，人的历史也罢，从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来看历史肯定是不同的，然而这应该是基本的共识或者叫常识才对，不过呢没常识，或者想书里后面提过的要对伪命题进行解答，其实就是对于毫无意义的事儿，不停的浪费时间罢了，只不过是大家都觉得时间这样浪费也无妨而已

20、《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21页

，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下层民众，而是在于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

21、《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4页

要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流动过程不仅仅是一套话语，而是我们尽量激活身体感觉来进入的那个用话语无法穷尽的主客体相互对话的过程。

22、《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16页

我现在要讨论怎么处理紫禁城这样的区域。过去是紫禁城，现在是中央政府，这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如何把这样一个最高权力作为一个区域来处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那中国只能是一，不能是多。

23、《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四章“中心”与“边缘”

但是，我们如果要在一个以人为历史主体的角度，这个中心—边缘就要随着人的活动和我们作为观察者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而改变。比如说，我如果以华南沿海的海上世界的人群为中心，从这个海上世界的人的活动来解释这个地区的历史，恐怕就要以南海或东南亚地区作为中心了。我讨论到如何理解华南沿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的话题时，常常喜欢用一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来简单地表达这种视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角区别。我在图上画两个圈，一个以西安为中心，一个以南沙群岛为中心。前者是王朝国家中心的统治范围，后者是环南海地区人群活动的空间。我们不仅可以分别以两个圆圈的圆心为“中心”，也可以在两个圆圈的重叠之处定义“中心”——帝国体系与海上世界交接的中心。

这只是一种表示中心—边缘可以多元化的简单方式，实际上，这种方式表达的只是一种多中心的理解，还并不是我真正的想法。中心—边缘的模型，与其说是多元的，还不如说是流动的，是随着你研究的问题或你研究的行为主体的改变而改变的。

所以，你只要走出了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成见，怎样去建立中心—边缘的模型就是一个不需要争议的问题。当然，更彻底的，是放弃中心—边缘的历史叙述结构，把中心—边缘的构想作为一种历史解释的工具与叙事方式。

2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105页

由于我们的思维能力有限，写作和表述也一定是有限制的.....任何一个研究，都一定有没有触及甚至根本没有想到的地方。何止研究很多问题上都是人的局限，限制了视野的范围，人眼所及不过是一百多度，上下也是如此，就算你能三百六十度，也还是有死角。所以就想书里说的我们要表达出来彼此交流，不然就连自己错了都不知道；

25、《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29页

我常常跟学生讲的就是，民众史未必是讨论民众的，民众史通常是精英用自己的精英视角去解释民众，因此我不认为做民众史的人一定有民众的观念、有民众的立场，他可能比做精英思想史研究的人还要精英化。这也是我不承认民众史与精英史对立这一套虚伪说辞的原因。

26、《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第85页

所有的边缘叙述，它由于过于把自己设定在和中心对抗的那个位置上，导致了它完全是在复制中心的逻辑

27、《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笔记-尾续语

第一，“寻找中国”，意味着我的研究不以“中国”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主体，这是对谈前面我要表达的立场；

第二，既然中国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主体，那么，我们深入其中去寻找“中国”的那个“历史”，逻辑上就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由人的行为建构的历史，中国必须在这个历史中才能够被认识；

第三，既然“中国”是通过历史来认识的，那么，不管这个历史是国家的历史还是地方或区域的历史，都是一样重要的，整体还是局部也都有着同样的意义，不会因为把中国当作整体，就要把区域看作局部，在这样的角度，普遍性问题和整体性问题都可以带出来了。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